

普京的俄國向何處去？

● 格沃斯捷夫
(Nikolas K. Gvosdev)

華盛頓對俄國未來的樂觀情緒已經煙消雲散。在2004年3月18日的國會聽證會上，國會的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海德 (Henry Hyde) 說：「很不幸，普京 (Vladimir Putin) 總統所採取的措施，看來動搖了該國的民主組織、實踐和制度保障」，這使人們對俄國的未來發展「產生懷疑」。尤科斯公司前首席執行官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的被捕，克里姆林宮加強控制媒體的努力，以及2004年5月普京在杜馬宣讀國情諮文時，指責俄國的一些親西方社團「為可疑的團體和商業利益效力」，凡此種種都使人得出結論：普京的目標是強化威權主義統治，阻撓民主自由和市場改革。

目前的悲觀態度，是對90年代過份樂觀的情緒的過激反應，當時許多美國觀察家抱着一種幻覺不放，從而低估了俄國的種種弊端。他們認為，後蘇聯時代的俄國在葉利欽 (Boris Yeltsin) 的領導下，正堅定地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想把俄國描繪成一個自由的盟友的願望，掩蓋了大量罪行，尤其是不斷摧殘俄國經濟的猖獗的腐敗現象。

這兩種立場——俄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或俄國是一種威權主義體制，都沒有認清後蘇聯時代俄國的複雜局面。當代俄國是一個「在功能和領土方面，重要的民主和威權主義特徵完全混雜在一起」的國家^①。她既希望跟西方特別是美國保持親密而有成效的關係，又要竭力維持她的影響力，尤其是對歐亞近鄰的影響力。所以，正如肯南 (George Kennan) 以「X先生」的筆名在1947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對蘇聯政權做出的全面分析一樣，我們也要對普京及其政權給予現實主義的評估。並且需要解釋，普京在啟動俄國的過程中，為何得到了如此廣泛的國內支持。

美國國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海德表示，普京所採取的措施，看來動搖了該國的民主組織、實踐和制度保障。目前的悲觀態度，是對90年代過份樂觀的情緒的過激反應。這兩種立場——俄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或俄國是一種威權主義體制，都沒有認清後蘇聯時代俄國的複雜局面。

一 是斯托雷平，不是斯大林

對於主導着普京及其班子的意識形態觀念，不易做出概括——「普京主義」仍是一個長期有用的表述。不過，普京在主政之初，他和他的班子便致力於

「用秩序和穩定代替葉利欽時代的混亂。普京在俄國加強縱向權力的政策，首要內容就是削減寡頭和地方要員的勢力」^②。這項措施為普京贏得了大量支持，尤其是做小生意的群體，他們希望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維護他們的安全，打擊寡頭和貪婪的地方政客。在2003年的議會選舉中，這些團體大都把票投給了親總統的統一俄羅斯黨；在2004年3月的總統競選中，又把票投給了普京本人。

普京顯然不想為民主而民主。如果民主的結果是一個經濟衰弱、政治無能的國家，他就更不想這樣做。俄國人並不想成為「另一個薩爾瓦多或牙買加」，這兩個國家「是典型的相對貧窮的社會，有着高於平均水平的社會福利」^③，但對世界的影響卻不足掛齒。

不過，普京團隊所設想的那個得到振興的俄羅斯國家，更像是沙皇年代晚期保守派改革家斯托雷平 (Petr Stolypin, 1906-1911年任總理) 的俄國，而不像是斯大林的蘇聯。1905年革命造成的混亂威脅到沙皇的統治，但尚不足以將他推翻。這場騷亂過後，斯托雷平一方面強調政治穩定，同時也着眼於推動經濟迅速增長。他認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以及現代化的、高效的政府機構，能夠使俄國重振大國雄風，尤其是在俄國於1904-1905年的戰爭中被日本打敗以後。

斯托雷平在擔任地方州長期間，就曾果斷採取嚴厲手段鎮壓革命者的騷亂，但是他也認識到，獨裁制度的命令方式，並不能帶來俄國所需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經濟多元化是必要的。斯托雷平最著名的改革計劃是打破傳統俄國的農村公社，鼓勵個人擁有農場，他希望由此形成一個支持其政策的新興中產階級。他操縱選舉法，把許多激進的民主派趕出了俄國議會 (杜馬)，但他也把這個初具雛形的立法機關，從革命演說家的講壇變成了有實效的議會。今天有不少俄國人相信，倘若斯托雷平的改革沒有因為他在1911年遇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中斷，他本來能夠把俄羅斯帝國改造成一個社會和政治制度與西方社會相差無幾的現代國家。

斯托雷平的格言——「你們需要偉大的劇變，我們則需要偉大的俄羅斯」，成了統一俄羅斯黨的口號，這並非偶然。我估計，斯托雷平的另一句口頭禪——「先立規矩，再談改革」，也會讓目前的克里姆林宮產生強烈共鳴。

二 受管制的多元主義

和斯托雷平一樣，普京也需要一個既保障政治穩定，又促進經濟發展的政權。不過普京的班子要應付一個難題：他們清楚一個多元競爭社會的巨大價值，但又擔心不受限制的多元主義——尤其是在沒有強大的中間組織的情況下——可能使俄國分崩離析。普京在1999年12月宣布，「俄國所經受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動盪，已經太過份了。」

普京顯然不想為民主而民主。普京團隊所設想的那個得到振興的俄羅斯國家，更像是沙皇年代晚期保守派改革家斯托雷平的俄國，而不像是斯大林的蘇聯。斯托雷平的格言——「你們需要偉大的劇變，我們則需要偉大的俄羅斯」，成了統一俄羅斯黨的口號，這並非偶然。和斯托雷平一樣，普京也需要一個既保障政治穩定，又促進經濟發展的政權。

他的行政班子認為，利用一種「不使國家與公共原則相互對抗」的體制，能夠最有效地避免進一步的破壞性震盪^④。統一俄羅斯黨的杜馬黨團副主席科林謝維奇 (Franz Klinsevich) 不久前斷定：「我們尋求政府和社會之間最廣泛的結盟，以便取得人人都清楚的目標，即為俄國人保障體面的生活水平，使人民恢復對自己祖國的自豪感。」^⑤

假如像肯南那樣，把斯大林主義理解為一種「官方絕對不承認反對黨……有任何好處或正當理由」的制度，那就不能把普京主義 (或稱為「新斯托雷平主義」) 當作斯大林主義。俄國政府並沒有隨心所欲的自由。普京行政當局在擬定政策時，必須爭取國內各個利益集團和選民的支持^⑥。

由此導致的格局，便是我所說的「受管制的多元主義」。這種體制為競爭和選擇留出一定空間，但是中央政府着眼於維護穩定或社會共識，對社會、政治和經濟選擇進行有意識的管制^⑦。所以普京主張，公民社會的大多數組織——從媒體機構到宗教組織——應當要麼在資金上直接依靠國家，要麼依賴願意對政府的關切做出回應的私人企業。

在政治領域裏，選舉、政策變動和更換領導人的機會依然存在。但是國家要發揮控制廣場集會人數、為論戰和偏離社會規範的行為設置界限的作用。這種體制是民主的——但只在一定限度之內。克里姆林宮毫不遲疑地動用「行政資源」給「反對黨候選人設置路障」^⑧。這包括操縱媒體，讓公務員四處遊說支持親政府的候選人，以及用欺詐手段影響選舉結果。但是民意調查表明，選舉結果確實反映着民意，無論它多麼不受西方的歡迎^⑨。

在經濟領域，受管制的多元主義贊成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它類似於當代日本、韓國或新加坡的公私合作制。普京在2004年5月的國情諮文中講得十分清楚，他說：「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必須掌控基礎設施的發展。同時，私人投資也可以為建立高質量的、可靠的基礎設施網絡做出重要貢獻。」

普京行政當局多次表明，不會全面糾正90年代中期的私有化，也不會重新全面推行資產國有化。他們知道，讓私人所有者 (包括外國投資者) 管理資產和賺取利潤，可以帶來經濟繁榮。然而普京的助手們也相信，政府在俄國的經濟發展中應當發揮顧問的作用。在他們看來，私人擁有財產——經濟資產和自然資源等——的權利，要由工商業界同國家一起促進共同利益的責任加以平衡。「在追求個人福利的同時，關心他人、國民和國家的福利」——這句話概括了他們的態度^⑩。

在受管制的多元主義之下，人們能夠在克里姆林宮劃定的範圍內追求個人利益。政府掌握着強大的手段，努力確保社會成員不越雷池半步。克里姆林宮在過去幾年採取的步驟——管制受寡頭支配的媒體，限制工商業界對政治過程的影響，修改選舉程序，並不是從一種田園詩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退步，而是對受管制的多元主義體制的鞏固。假如我們承認，普京政府的目標並非不惜代價建立自由民主，而是繼續進行有序的改革，就會更清楚這一點。

普京的行政班子認為，利用一種「不使國家與公共原則相互對抗」的體制，能夠最有效地避免進一步的破壞性震盪。在「受管制的多元主義」下，政府掌握着強大的手段，努力確保社會成員不越雷池半步，管制受寡頭支配的媒體，限制工商業界對政治過程的影響，修改選舉程序。這體現出普京政府的目標並非不惜代價建立自由民主，而是繼續進行有序的改革。

三 垮掉的超級大國

推行穩步改革的願望，是普京班子一種認識的自然結果：俄國是一個垮掉的超級大國、一個已經衰敗的強權。葉利欽仍然沉迷於一種幻覺，以為後蘇聯時代的俄國大體上仍可以和美國在世界舞台上平起平坐。現在的政府承認，俄國既沒有能力同美國競爭，也無法與她一起擔當新世界秩序的保護人。她最大的擔心是，工業退化、人口減少的俄國，將變成一個給發達國家提供原材料的配角，最終導致俄國對世界、甚至對其歐亞近鄰的影響力蕩然無存，並有可能失去對俄國各地的控制。

普京班子認識到：俄國是一個垮掉的超級大國。俄國既沒有能力同美國競爭，也無法與她一起擔當新世界秩序的保護人。俄國願意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接受某種角色。俄國有着更加溫和平實的需要——恢復俄國在歐亞區域的霸權，以及她在世界列強俱樂部中的會員資格。「九一一」事件剛過，克里姆林宮就希望美國承認俄國「區域強權」的地位並提供支持。

當代俄國在國際事務中軟弱無能。例如，對於美國決定退出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或是要對伊拉克動武，普京一班人知道，徒勞地試圖阻止美國人的行動，只能一無所獲。他們的全部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為俄國提供喘息的空間，使她能夠完成改革進程，這非常類似斯托雷平的政策^①。

普京對於國家的積弱現狀不存幻想。他在2001年11月嚴辭批評俄國的國防設施，說它「老舊不堪」，無法應對現代的軍事和政治挑戰。讓俄國變成一個更開放的社會——把她更緊密地整合到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是俄國能夠獲得資金與投資的不二法門；為了及時而有效地進行「工藝技術的現代化」，這些投資是不可缺少的。

不過，俄國也確實握有幾張地緣戰略的王牌——石油和天然氣，地理位置和智力資本等等。現在的政權不打算像蘇聯時期那樣為了整個世界而孤注一擲，她有着更加溫和平實的需要——恢復俄國在歐亞區域的霸權，以及她在世界列強俱樂部中的會員資格。

當代俄國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假如她有能力影響事態的發展，她願意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接受某種角色。普京根本不想重建一個跟西方對抗的超級大國，但也不認為俄國不應在世界上發揮任何影響。在2004年6月的八國集團峰會後，普京重申了這一立場。他說，俄國不會為「大中東倡議」提供資金援助，除非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其實，莫斯科只要看看讓美國頭痛的主要外交政策問題就會相信，俄國擁有的關係、網絡和基本設施，能夠使她在支持美國的關鍵利益上取得積極成果。打贏反恐戰爭，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的擴散，為西方世界的能源供應提供一個更安全的保證——俄國認為自己是解決方案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九一一」事件剛過，克里姆林宮就希望美國承認俄國「區域強權」的地位並提供支持，這樣俄國就可以作為美國在歐亞地區的代理人採取行動。有些人甚至想像出一種「特殊關係」：俄國將成為美國在中亞和歐洲大陸國家的對話者。假如美國不為實現這些目標提供幫助，克里姆林宮便打算改變戰略：減少對美國倡議的積極支持，同另一些大國——尤其是法國、德國和中國——聯手制衡

美國的行動，以此提高美國採取單邊行動的成本。俄國人要清楚地表明，美國不能把自己的收穫視為理所當然。具體而言，華盛頓不能既期待克里姆林宮配合美國的優先考慮，又無視或反對莫斯科的關切。

普京相信，為美俄夥伴關係建立一個牢固的基礎是值得的，但必須對雙方有益。假如無法形成夥伴關係，俄國也有另一種選擇。美國可以繼續充當唯一的超級大國，但不可能做到事必躬親，在俄國的傳統後院歐亞地區尤其如此。

四 近 鄰

應當明確指出，目前領導層的目標不是重建蘇聯。但是，不管持何種政治立場的俄國人，都有理由把歐亞鄰國（指前加盟共和國）視為「近鄰」，俄國同世界其他地區的交通線要穿越這些國家。它們——尤其是中亞各國——為俄國腹地構成了一道抵擋敵對勢力、特別是伊斯蘭激進主義的屏障。這個地區存在着複雜的市場網絡、基礎設施（如輸油管和鐵路）、文化組織甚至個人交往，它們構成了一個「共同的歐亞空間」。副外長特魯伯尼科夫（Vyacheslav Trubnikov）在接受《獨立報》（*Nezavisimya Gazeta*，2000年5月14日）的採訪時，把歐亞地區稱為「對我們生死攸關的地方」，理由是這裏有着「共享的和發達的基礎設施」。

前外交部長伊萬諾夫（Igor Ivanov）在2002年出版的《俄國新外交》（*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一書中說：「鑑於俄國的幅員、人口和經濟實力，設想她在〔歐亞地區〕發揮軸心作用是理所當然的。」若按西方的標準，俄國仍然貧困和不發達，但她在歐亞地區依然保留着宗主國的權力。作為該地區的頭號大國，她實行的戰略是阻止一切外來勢力動搖俄國的利益。俄國特別擔心歐亞地區的一些政府謀求外來大國的參與，以此作為制衡俄國的手段——這是一種俄國版的門羅主義（美國總統門羅 [James Monroe] 在1823年宣布的政策：歐洲列強不應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

普京行政當局不想把經濟資產重新國有化（從而直接進行管理），同樣，他們也沒有多少熱情把另一些國家重新組合成一個新蘇聯。在俄國，任何負責任的人都不想用寶貴的資源去援助另一些共和國。因此，讓各國保持獨立才符合俄國的利益，這意味着歐亞地區政府必須親自承擔主要責任，滿足人民的社會福利需要。第比利斯、塔什干或基輔在冬季是否有足夠的能源和供熱，或它們的醫療和教育體系是否有效，這與俄國何干？

所以，在一定程度內，俄國並不反對這些歐亞國家同其他國家發展輔助性的政治和經濟關係——只要俄國的關鍵利益受到尊重。但是在莫斯科完全說了算的地方，俄國確實想建立一個歐亞經濟和政治區。

俄國經濟在1998年開始復蘇，加之過去幾年石油價格高企，使俄國商界獲得大量現金，可以用來購買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中亞各國以及前蘇

俄國人認為歐亞鄰國、尤其是中亞各國為俄國腹地構成了一道抵擋敵對勢力、特別是伊斯蘭激進主義的屏障。前外交部長伊萬諾夫曾說：「鑑於俄國的幅員、人口和經濟實力，設想她在〔歐亞地區〕發揮軸心作用是理所當然的。」作為該地區的頭號大國，她的戰略是阻止一切外來勢力動搖俄國的利益。俄國確實想建立一個歐亞經濟和政治區。

聯集團成員國的經濟資產。這一過程有時也受益於那些先是購買資產後又決定賣掉的美國和歐洲公司的退出，例如在格魯吉亞、立陶宛和保加利亞。過去幾年裏，在一些自身地位不確定、希望同莫斯科改善關係的歐亞國家，俄國的勢力也在增長。自蘇聯解體後，俄國第一次獲得了真正的機會，能夠對一些歐亞國家的每一件事情施加影響——從政府的組成到公布經濟政策。

俄國的首要目標，是確保這些歐亞國家不能阻止俄國經過她的領土與外部世界交往；確保沒有任何外國軍隊駐扎在該地區，除非得到俄國的允許（比如為了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任何歐亞國家都不應加入俄國並不屬於其成員國的軍事集團或同盟。在這方面，俄國推動了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它聯合了俄國、中國和一些中亞國家。俄國把它作為在美國支持的五國集團（格魯吉亞、烏克蘭、烏茲別克、阿塞拜疆和摩爾多瓦）之外加強區域集體安全的另一種選擇。儘管五國集團得到了美國的積極援助，但是上海合作組織同它相比，在促進反恐合作、為成員國之間更緊密的經濟合作建立框架方面，更有成效^②。

俄國不想同外部世界隔絕，她想充當與歐洲—大西洋共同體加快整合的主動力。在烏克蘭時常可以聽到「去歐洲，但要帶着俄國人」的口號。但美國和歐盟都向俄國清楚表明，不能把波羅的海國家劃入「歐亞地區」。讓莫斯科大惑不解的是，西方為何期待她在歐亞地區放棄地緣戰略的領導權，更讓他們吃驚的是，居然要求她為自己的利益損失提供補貼。

莫斯科也致力於在俄國、烏克蘭、哈薩克和白俄羅斯之間建立一個「單一經濟區」——大體上遵循歐洲共同體最初的步驟，希望能使俄國的資本和商品更有效地跨界流動。俄國不想同外部世界、尤其是發達的西方隔絕，她想充當與歐洲—大西洋共同體加快整合的主動力。在烏克蘭時常可以聽到的口號：「去歐洲，但要帶着俄國人」，便反映着這一方針。

當然也有限制。美國和歐盟都向俄國清楚表明，不能把波羅的海國家劃入「歐亞地區」。為了給這種要求壯大聲勢，她們不但發表強硬的外交聲明，還動用大量資源強化自己的言辭（並在這些國家建立起真正願意從事改革的政府）。讓莫斯科大惑不解的是，西方為何期待她在歐亞地區放棄地緣戰略的領導權，因為在這些地區，根本就不存在西方的協同努力。更讓他們吃驚的是，居然要求她為自己的利益損失提供補貼，例如為後蘇聯地區保障供電，為歐亞地區國家的公民提供潛在的社會補助（通過天然氣折扣價，或在俄國居住和工作的權利），而它們的政府卻能無視俄國的商業和安全關切。對於任何俄國政府來說，這都是不合邏輯的政策——尤其是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回報。

五 美國的反應

很多美國人不喜歡現在的俄國。她既不是充分自由的國家，也不是「可靠的」盟友。美國國內的各種利益集團——從宗教自由的鼓吹者到媒體監督員——都對普京的俄國壓縮公民和政治自由範圍的做法感到不快。還有另一種不安，對於二十一世紀歐亞地區的「門戶開放」，即允許這些國家安排自己的道路，不必考慮俄國的利益，正在復興的俄國似乎不感興趣。儘管存在着種種失望情緒，這是一個美國能夠與之相處的俄國嗎？

有一則傳聞，說的是1992年一個美國商人同聖彼得堡政府的一位匿名官員的交談。「眼下俄國也許跪下了」，這個俄國人說，「不過當她站起來時，她是不會忘記自己的遭遇的。」然而，美國的政策似乎是根據如下假設而作出的：俄國將一直處於90年代的衰敗狀態，她別無選擇，只能唯華盛頓馬首是瞻。假如俄國在下一個十年站起來了，那麼任何假設俄國將接受歐亞地區現狀的政策，以及根據一個軟弱的俄國預見未來的世界，都將是愚不可及的。

不錯，普京振興俄羅斯的努力有可能是短命的。可是美國也要問一句，俄國的衰敗是否符合美國的關鍵利益？在這個邊緣地區，假如在幾年內能夠建起一個強大而有效的國家隔離帶，那麼俄羅斯的解體對歐亞地區和其他地方的衝擊，或許能夠受到控制。不過那裏並不存在這樣的隔離帶，在幾年內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來。烏克蘭、格魯吉亞和烏茲別克都很難成為適當的成員。種種迹象表明，為了把一種政策願望變成牢固的現實，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但美國及其西方夥伴並不想這樣做。

例如，美國在過去十年裏已向格魯吉亞注入了一百多億美元。如此巨額的援助，對於解決這個小國持續不斷的種族和地區衝突，或緩解其嚴重依賴俄國能源和經濟的狀況，卻收效甚微。有人主張，美國應當不計代價地大力支持一種浪漫的幻想，即建立一個從黑海到波羅的海的共同體，或是一個絲綢之路聯盟。但顯而易見，這種做法的成本之大是難以承受的。美國在東亞和中東還有一些更緊迫的事情需要處理，甚至希望俄國幫助她達到這些目標。假如歐亞地區是日程表上唯一的事項，情況或許有所不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九一一」事件確切證明了這一點。

恕我直言，在歐亞地區削減俄國勢力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省錢的買賣。目前，美國的努力似乎是要加強歐亞各國。但是這些計劃的長期影響，只會使這些邊緣國家擁有更多制衡俄國的手段，卻不會使它們徹底脫離同俄國的關係。歐亞各國與俄國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紐帶十分牢固，小規模的軍訓計劃根本不足以把它們斬斷。

不喜歡這種分析的人說，這等於「姑息」獨裁政權，為了得到俄國支持而放棄歐亞地區「熱愛自由」的國家，無異於重蹈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的覆轍：他曾在雅爾塔會議上把東歐的控制權拱手送給了斯大林。但是，美國真的擁有革新歐亞國家並讓俄國束手無策的本錢嗎？正如科普蘭 (Robert D. Kaplan) 所言，問題在於「改造這個地區……既要有傳教士的決心，又要有赤裸裸的權力欲，西方可能根本不具備這種素質，考慮到相對鄰近而又不大危險的巴爾幹國家的麻煩，事情就更是如此。」^③以為美國不必真正投入時間和精力，就能迫使俄國放棄追求她視為理所當然的合法利益，這往好處說是天真，往壞處說則會適得其反。

乾脆把歐亞國家納入不斷擴張的歐盟，使其脫離「俄國」地盤——這種設想也沒有任何現實基礎。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蒂 (Romano Prodi) 在2002年底對此說得很明白^④：

傳聞1992年一個美國商人同一位聖彼得堡政府官員交談。「眼下俄國也許跪下了」，這個俄國人說，「不過當她站起來時，她是不會忘記自己的遭遇的。」美國的政策似乎假設俄國將一直處於90年代的衰敗狀態，只能唯華府馬首是瞻。但俄國衰敗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在歐亞地區削減俄國勢力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省錢的買賣。

巴爾幹國家加入歐盟，將完成歐洲大陸的統一。……我不否認這一過程進展順利。但是我們不能無休止地擴大。我們不能給歐洲的政治設計注水，把歐盟變成一個歐洲範圍的自由貿易區。

即使歐盟答應在未來接納歐亞國家，也僅限於「大歐洲經濟區」和「大歐洲社會區」的框架，它們都來自於莫斯科同布魯塞爾之間的對話，並不屬於同美國結成的戰略聯盟的內容。

所以問題是，美國能否與俄國達成一項折衷方案，既能保障美國在歐亞地區的利益，又讓復興的俄國在這裏發揮更大的政治和經濟作用。這裏有必要指出，今天的情況與1947年肯南的時代有一個根本差別。蘇聯主宰歐亞地區，使她能夠威脅到飽受戰火蹂躪的西歐和東亞。今天，即使俄國完全控制了歐亞地區——這一目標成本之高，使莫斯科連想都不敢想——她也會受到歐盟、中國和日本的鉗制。

明確區分美國的利益和歐亞國家的利益也至關重要。格魯吉亞、烏克蘭或烏茲別克（以及它們在美國的支持者）或許想讓美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抵消俄國的經濟和政治影響。但是，穩健的對俄政策不應建立在主張上，而應建立在分析上。美國在「九一一」之後，為了配合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而把軍隊派往歐亞地區，這證明了當美國的關鍵利益受到威脅時，能夠對歐亞地區進行目標明確、範圍有限的成功干預，並且能夠得到俄國的默許。

美國顯然對俄國的變化感到不快。但是，儘管存在着種種不利，還是有許多方式能夠成功地讓俄國給予配合。現在孤立俄國，只會適得其反。即使目前的形勢不變，仍然存在着一些能讓美國和西方國家影響和塑造俄國發展的渠道^①。俄國希望得到資本和市場，這就為她促進區域穩定提供了動力。隨着商業和政治交往的成熟，俄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將日益與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利益聯繫在一起。隨着俄國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她的行為、尤其是在歐亞地區的行為，也將變得更容易預見，更加透明。

肯南在五十年前斷定：「相關的外國政府與俄國成功打交道的先決條件是，它要隨時保持沉着冷靜，在對俄國的政策提出要求時，應當給不過份傷害俄國面子的順從留出餘地。」在思考俄國的行動根源時，這仍是我們應當恪守的金玉良言。

馮克利 譯

今天，即使俄國完全控制了歐亞地區，她也會受到歐盟、中國和日本的鉗制。美國顯然對俄國的變化感到不快。但是，現在孤立俄國，只會適得其反。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能讓美國和西方國家影響和塑造俄國發展的渠道。俄國希望得到資本和市場，這就為她促進區域穩定提供了動力。隨着俄國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她的行為也將變得更容易預見，更加透明。

註釋

① 這裏借用了奧唐納(Guillermo O'Donnell)對拉丁美洲的描述，見Guillermo O'Donnell, *On the State, Democratization, 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A Latin American View with Glances at Some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192 (Notre Dame, IN: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10-11。

- ②⑧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 at the Poll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2), 1; 101-19, 137-38.
- ③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Hilton L. Root, "The Political Roots of Povert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8 (Summer 2002): 33.
- ④ 這是普京的盟友之一、奔薩州州長波切卡列夫 (Vasily Bochkarev) 的評論，轉引自Nikolas K. Gvosdev, "‘Managed Pluralism’ and Civil Religion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Russia*, ed. Christopher Marsh and Nikolas K. Gvosdev (Lanham, MD: Lexington Press, 2002), 75。
- ⑤ 轉引自Nikolay Krivous, "We Are Not Going to Create Another CPSU", *Rossiyskaya Gazeta*, 26 October 2001。
- ⑥ Paul J. Saunders, "The U.S.-Russia Relationship After the Iraq War", in *Russia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ed. Nikolas K. Gvosdev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ress, 2004), 263.
- ⑦ 見Nikolas K. Gvosdev, "Tolerance versus Pluralism: The Eurasian Dilemma",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12, no. 7-8 (December 2000); "Managing Pluralism: The Human Rights Challenge of the New Century", *World Policy Journal* 18, no. 4 (Winter 2001/02); 以及"Constitutional Doublethink, Managed Pluralism,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29, no. 2 (June 2001)。
- ⑧ 在最近一次議會選舉中，近一半杜馬成員落馬。原杜馬成員所遭受的損失，不但見於政黨名單制選舉中，也見於單一議席制的選區。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俄國視為民主國家。《民主雜誌》(*Journal of Democracy*) 主編戴蒙德 (Larry Diamond) 說：「選舉制的民主能夠同嚴重侵犯人權、普遍腐敗和法治欠缺的現象並存。但是，一個國家要想維持民主，必須對這些缺陷做出足夠的限制，至少在選舉中，選民的意願能夠反映到選舉結果之中，尤其是能夠把不受歡迎的人趕下台。」Larry Diamond, "Universal Democracy", *Policy Review*, no. 119 (June/July 2003).
- ⑨ 這是一份新的商業倫理守則中的「第一項要求」。該守則在世界俄國人大會第八屆會議 (2004年2月) 上提交。該組織是一個公民社團，與會者是來自宗教、文化、政治和商業組織的代表。
- ⑩ 參見Damjan de Krnjevic-Miskovic, "Why Russia Did Not Veto", *Izvestiya*, 20 November 2002。
- ⑪ 這些觀點是俄羅斯副外長特魯伯尼科夫在接受《獨立報》訪問時提出來的。
- ⑫ Robert D. Kaplan, *Eastward to Tart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302.
- ⑬ 在「和平、安全和穩定：國際對話與歐盟的作用」會議上的發言："A Wider Europe—A Proximity Policy As the Key to Stability". Sixth ECSA-World Conference, Jean Monnet Project, Brussels, 5 December 2002。
- ⑭ 美國的企業和思想庫在莫斯科等地設有分部，不僅在斯大林時代，甚至在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時代，這都是不可能的。它們使美國的「最佳做法」得以在各地傳播。許多直言不諱批評普京行政當局的人，其中一些還受僱於美國的機構，仍能夠自由地出版、演說和旅行，這些事實清楚表明，現在的俄國不管有多少缺陷，她不是一個「新斯大林主義」國家。

格沃斯捷夫 (Nikolas K. Gvosdev) 《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雜誌執行主編、尼克松中心高級研究員。主要著述有 *Imperial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s Georgia, 1760-1819* (2000)，並編有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Russia* (2002)、*Russia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4)。